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2005年日本眾議院改選的政經意涵

The Implication of Japanese Diet Election in 2005

doi:10.30390/ISC.200604_45(2).0001

問題與研究, 45(2), 2006

Issues & Studies, 45(2), 2006

作者/Author：蔡增家(Zheng-Jia Tsai)

頁數/Page：1-2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6/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604_45\(2\).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604_45(2).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2005 年日本眾議院改選的政經意涵

蔡 增 家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二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 要

在 1990 年代全球化的浪潮下，東亞國家紛紛實施政治民主化與市場自由化，來改變過去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發展體制，但是日本卻是東亞國家當中改變幅度最小的國家，去年 9 月 11 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所領導的自民黨，在日本國會改選當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這是日本戰後以來最重要的一次選舉，因為在這次選舉之後，道路公團改革及郵政民營化將會逐漸瓦解自民黨內的派閥勢力，其次自民黨內大量新人的當選也會促成日本朝野新保守勢力的匯集，這將徹底改變過去政府主導的政經體制，同時也改變過去日本政界、官界及財界鐵三角的共生關係。本文主要論點認為：造成日本這次巨大改變是來自於經濟層面的因素，日本經濟的持續衰退營造小泉改革的環境，同時也讓小泉得以放手進行改革，然而造成日本這波戰後以來最長一次的經濟衰退卻是與全球化效應息息相關的，因此，本文將嘗試從全球化對國內體制的影響來分析這次日本國會改選的真正意涵。

關鍵詞：新保守勢力、自民黨、道路公團改革、郵政民營化、派閥政治、日本

* * *

壹、前 言

去(2005)年9月11日，日本舉行眾議院大選，首相小泉純一郎所領導的自民黨獲得空前的勝利，在應選 480 席當中獲得 296 席，不但取得過半的席次，同時也比原本的 212 席大幅增加了 84 席；執政聯盟的公明黨獲得 31 席，比原本席次減少了 3 席。反觀在野黨方面，最大的在野黨民主黨是最大的輸家只拿到 113 席，比原來的席次大幅減少 64 席；其它的社民黨增加 2 席為 7 席，共產黨維持 9 席，新成立的國民新黨 4

席，新黨日本1席，無黨籍19席。^①

首先就量的改變而言，從各黨席次的轉變，我們可以發現執政的自民—公明聯盟所獲得的327席已經超過衆議院席次的三分之二，小泉所領導的執政聯盟已經足以操控衆議院的任何一項法案了；另外就算自民黨本身所得到的296席也足以單獨在衆議院當中過半，這是日本從1993年單一選區兩票制實施以來，自民黨首次不用與其他政黨結合就能夠達到過半的席次。自民黨席次的過半讓小泉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進行郵政民營化改革；郵政民營化改革之後，不但會大幅降低日本高築的財政赤字，同時也會讓在自民黨內勢力盤根錯節的政治派閥逐漸瓦解。^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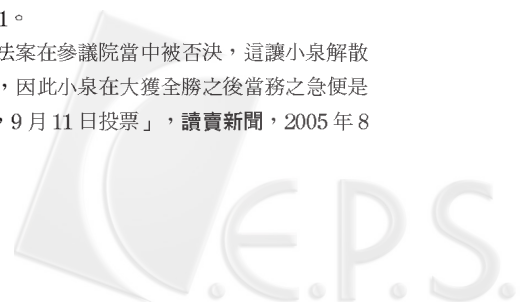
其次在質的變化而言，在這次國會改選當中，自民黨內有83名首次當選議員進入了日本國會，這是自民黨從1955年體制以來最大一次的換血，也是日本政壇第二次的世代交替；因為就在1990年代，由於自民黨垮台所造成日本政黨政治的戰國時代，當時曾經也有大批的新生代議員代表在野政黨當選國會議員，形成日本戰後的第一次世代交替。因此當日本歷經這兩次世代交替之後，不但促成日本朝野新保守勢力的匯集，同時也稀釋自民黨派閥的政治勢力，改變過去日本政界、官界及財界鐵三角的共生體制。

由此可見，我們可以發現這次國會選舉對日本產生的兩項衝擊便是自民黨派閥的瓦解及新保守主義浪潮的興起，這是日本戰後以來最重要的一次選舉，因為在過去1990年代全球化的浪潮下，東亞國家紛紛實施政治民主化與市場自由化，來改變過去以政府爲主導的經濟發展體制，但是保守的日本卻是東亞國家當中改變幅度最小的國家。那麼本文不禁要問：為何在歷經90年代自由化的浪潮都沒有產生轉變的日本，為何會在此時出現巨大的改變呢？那麼又是何種力量促成日本的改變呢？本文主要論點認爲：造成日本這次巨大改變是來自於經濟層面的因素，日本經濟的持續衰退營造小泉改革的環境，同時也讓小泉得以放手進行改革；然而造成日本這波戰後以來最長一次的經濟衰退，卻是與全球化效應息息相關的，因此，本文將嘗試從全球化對國內體制的影響來分析這次日本國會改選的真正意涵。

本文內容區分成七個部分：首先是前言，介紹本文的研究動機與主要論點；其次第二部分是敘述1990年之後日本經濟的衰退與全球化的關連性；第三部分則是介紹2001年4月小泉上台之後，順應全球化趨勢而所實施的構造改革；第四部分及第五部分則是分別分析郵政民營化及新保守勢力興起，對日本所產生的政治經濟效應；第六部分則是結合理論與實證，以日本道路公團改革爲例來探討全球化與日本政經體制轉變的關係；最後則是依據以上的分析做簡單的結論。

註① 「自民黨壓勝296議席」，*讀賣新聞*，2005年9月12日，版1。

註② 這次日本國會改選的最主要原因便是小泉所推動的郵政民營化法案在參議院當中被否決，這讓小泉解散國會重新進行改選，將郵政民營化的支持與否直接訴諸於民意，因此小泉在大獲全勝之後當務之急便是重新讓郵政民營化法案在國會中表決通過。請參閱「衆院解散，9月11日投票」，*讀賣新聞*，2005年8月9日，版1。



貳、全球化與日本經濟衰退

二次大戰後，東亞地區是全球經濟發展最為快速的地區。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是在 1960 年代由日本所啓動，日本發展一套獨特的政經體制來協調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並有效降低民主政治及自由市場的交易成本，讓日本經濟能夠在短期間之內快速成長。到了 1970 年當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這套日本經濟發展模式很快的被移植到南韓與台灣，同時它也在 1970 年之後成功地帶動這兩個國家經濟的快速成長，並且也讓南韓與台灣擠身於亞洲四小龍之一，於是政治經濟學者便以發展國家論來解釋戰後日本的政經發展模式。^③

那麼何謂發展國家論呢？簡單來說，發展國家論主要是以政府來主導經濟政策走向、以銀行體系爲企業資金的主要來源以及營造一個封閉保護的國內市場體系。換句話說，也就是政府以全能的官僚來主導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同時控制銀行體系以讓企業能夠獲得低廉的資金來提升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最後則是要管制國際資本的進入以有效貫徹政府的經濟主張。^④

若將發展國家論套用到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其具有以下三種特性：首先是日本利用政界（派閥）、官界（官僚）及財界（企業）鐵三角關係來主導國家經濟的發展，派閥主導確保了自民黨長期的一黨執政，官僚空降到國會及企業強化了政府政策的貫徹實施，企業的政治獻金則維繫了政治派閥的經濟命脈；^⑤其次是日本以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來提升經濟的成長，日本政府利用郵政體系的龐大資金來投入公共工程建設，這些公共建設不但支撐了經濟成長，也維繫了派閥的地方利益；^⑥最後則是日本營造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互惠性同意，日本政府管制外國企業及資金的進入，同時也嚴格管制國內企業經營的家數，這不但讓企業獲得壟斷性的經營許可，同時也有效避免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而日本企業則以積極配合政府的產業

註③ 有關發展國家論的相關著作，請參閱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Alice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tepha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Karl Fields, *Enterprise and the State in Korea and Taiw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註④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5.

註⑤ 青木昌彦、奧野正寬及岡崎哲二編著，*市場の役割、國家の役割*（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0 年 8 月），頁 10~16。

註⑥ 樋渡展洋，*戰後日本の市場と政治*（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 年），頁 41~46。

政策來回饋政府。^⑦

日本這種以政府為主導、企業配合及封閉市場體制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確在1960年代成功地促進了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但是到了1980年之後，在美國壓力及自由化浪潮的衝擊下，東亞國家紛紛開放國內市場大門，造成外國資金開始大舉進入東亞國家的資本市場；這不但打破了過去封閉保護的市場體制，也讓所謂的日本經濟發展模式逐漸失去效用。例如在1985年美國政府便聯合英國、法國及德國等西方工業國家簽署「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在協議中要求日本以日圓升值的方式來縮減日本與美國之間的貿易逆差。因此在廣場協議之後，日圓便開始急遽升值，從1985年的245日圓對1美元升值到1993年的87日圓對1美元。日圓的升值效應讓外國資金大量流入日本，形成1986至1990年期間的日本泡沫經濟；但在這波自由化的浪潮下，日本仍然堅持過去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這項堅持讓日本從1990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後，便開始陷入了戰後以來最長一次的經濟衰退。^⑧

從1991年第二季開始，日本經濟便開始持續下滑。日本政府雖然一方面進行片面的體制改革，一方面則仍然沿用過去以擴大政府支出來提升國內景氣的方式；因此從1991年至2001年的十年當中，日本總共歷經八位首相，實施了選制改革、財政改革、金融改革及行政改革，但是日本經濟仍然沒有起色，其主要原因便在於全球化對日本國內政經體制的衝擊。^⑨換句話說，也就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當國際資本已經衝破國界的藩籬，改變了經濟政策的制定權，轉變了貨幣與利益的決定權，也弱化了政府權威的角色，日本政府仍然使用過去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這讓日本政府的經濟政策失靈，形成日本在1990年之後經濟衰退的根源。^⑩

那麼全球化如何讓日本政府的經濟政策失靈呢？本文認為首先全球化的浪潮衝破了過去日本政府主導模式經濟過程，同時形成三個重要的潰堤點：第一個潰堤點是派閥主導造成日本政府管制經濟能力的衰退。在過去經濟高度成長期，日本政府主要是依賴政界、官界與財界的鐵三角來主導經濟政策，而官僚體系便是鐵三角體制的主導者；但是在全球化之後，經濟政策的主導權卻逐漸從行政體系的官僚轉變到國會的政治派閥手中，這讓日本經濟政策的制定越來越受到地方利益與派閥勢力的左右。^⑪

其次是資金來源多樣化降低日本政府對企業的管制能力。在過去經濟高度成長期，日本政府可以控制銀行體系來管制企業的資金來源，以讓企業能夠配合政府的經濟政

註⑦ Kent Calder, *Strategic Capitalism: Private Business and Public Purpose in Japanese Industrial Fina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0~46.

註⑧ Yoichi Funabashi, *Managing the Dollar: From the Plaza to the Louvre*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7), pp. 249~252.

註⑨ William Grimes, *Unmaking the Japanese Miracle: Macroeconomic Politics, 1985-200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0~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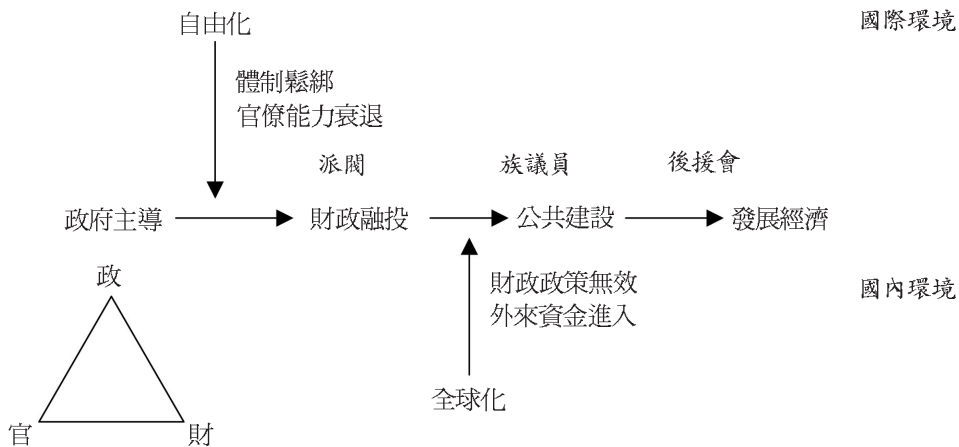
註⑩ Bai Gao, *Japan's Economic Dilemm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10~112.

註⑪ Gerald Curtis, *The Logic of Japanese Politics: Leaders, Institutions, and the Limits of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15.

策；但是在全球化之後，企業獲取資金的管道多元化了，它不但能夠從外國銀行取得資金，也能夠透過資本市場來募集資金，這讓日本政府無法再以偏好性的貸款來管制企業的發展政策。^⑫

最後是國內市場的開放造成日本政府財政政策的失靈。在過去經濟高度成長期，日本政府可以營造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並透過財政融投來獲取郵政體系鉅額的資金，以擴大政府公共建設支出來刺激國內的經濟景氣；但是在全球化之後，政府的公共建設逐漸被地方派閥及椿腳所壟斷，形成沒有效率的投資，這不但造成財政政策的失靈，也讓日本政府累積鉅額的財政赤字（請參見圖一）。^⑬

圖一 全球化與日本經濟衰退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全球化之後，日本經濟衰退的最主要原因在政治層面就是政治派閥的主導，在經濟層面就是財政赤字的高築；日本政府必須要改革派閥體制、削減財政赤字，才能夠讓日本走出經濟衰退的陰霾。其實在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東亞國家（例如南韓）都已經逐步改變過去的日本經濟發展模式，以調適全球化之後國際環境的轉變，^⑭但是日本卻仍然持續在抗拒這股全球化的力量，直到 2001 年 4 月小泉純一郎上台之後，他順應全球化的潮流，打著消滅自民黨內派閥及構造改革大旗，想要對自民黨內過去的政界、官界及財界的鐵三角關係進行結構性的改革。下一節便是要分析小泉上台之後，如何順應全球化趨勢來進行構造改革。

註⑫ Masahiko Aoki and Hugh Patrick, eds., *The Japanese Main Bank System: Its Relevance for Developing and Transforming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8.

註⑬ 眞淵勝，「財政政策の成功と金融政策の失敗」，村松岐夫、奥野正寬編，平成バブルの研究：崩壊後の不況と不良債權處理（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2年），頁98~99。

註⑭ 姜英之，韓國經濟挫折と再挑戰：漢江の奇蹟は二度起こるか（東京：社会評論社，2001年），頁4~9。

叁、順應全球化趨勢：小泉的構造改革

從上一節分析我們知道 1980 年代的全球化造成日本的泡沫經濟，^⑤而 1990 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後，不但讓日本經濟開始陷入停滯，導致不動產業的崩解，同時也讓銀行體系累積鉅額的不良債權。而當時日本政府卻仍然堅持以政府主導的方式，來擴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以刺激國內景氣，但是在派閥壟斷政治體制下，這些由政府支出所興建的公共建設便淪為政治派閥鞏固地方票源的工具，這也讓日本政府累積高額的財政赤字；因此當 2001 年 4 月小泉純一郎上台之後，他就同時面對了銀行鉅額的不良債權及政府高築的財政赤字，在這種情況下，小泉提出構造改革、消滅黨內派閥及削減財政赤字的三項主張。所謂構造改革就是要改變過去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體制，而消滅黨內派閥是要進行郵政民營化以斬斷其背後的經濟來源，道路公團改革則可以有效改變政府無效率的投資，來降低政府的財政赤字。^⑥

首先在構造改革方面，其並不像過去的改革只是包含金融制度、或是財政結構等單一面向的改革，構造改革是一種全面向的改造，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改造現有的政經體制及解決泡沫經濟的後遺症。首先在改造現有的政經體制方面，其主要政策可以區分成：解決公營機關無效率的狀態、消除既得權的存在、改變日本僱用習慣、以及改變企業交叉持股習性等四項。

若再根據這四項政策逐項檢閱，我們發現解決公營機關無效率的方案，有進行公法人民營化的規制緩和措施；消除既得權，則是要改變預算分配不平均的現象；改變日本僱用習性，則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率的僱用措施；最後在改變企業交叉持股習性方面，則有大企業強化措施及企業僱用文化的改變。^⑦

另外在解決泡沫經濟的後遺症方面，其主要政策可以區分成降低銀行的不良債權、減少企業的過剩、減少政府的財政赤字以及弱者保護等四項，若再根據這四項政策逐項加以檢閱，我們發現解決不良債權的方案，則有不良債權的最終處理方案及產業重整；解決企業生產過剩，則是要增加企業的經營效率；解決政府財政赤字，則必須要有稅制年金歲出構造的財政改革；最後若是要進行弱者保護，則是要積極進行公法人

註⑤ 1986 年至 1990 年期間的日本泡沫經濟發生的遠因在於 1985 年的「廣場協議」，近因則在於日本各大企業不專注本業，過度投資不動產，造成土地建物的成本高漲，以致喪失國際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一旦不動產出現任何風吹草動，將會造成金融體系鉅額的不良債權，以致牽動整體經濟發展。

註⑥ 有關 2001 年 4 月小泉上台之後的各項改革，請參閱田中直毅，**構造改革とは何か**（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1 年）；塚崎公義，**圖解よくわかる構造改革**（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1 年）；塚崎公義，**よくわかる構造改革**（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1 年）；丹羽春喜，「小泉構造改革で日本は破局を迎える」，**正論**，2001 年 9 月，頁 149～151；屋山太郎，「財政構造改革の成否が小泉改革のカギだ」，**世界週報**，2001 年 6 月 12 日，頁 25～36；齋藤精一郎，「構造改革の本質は『ノーペイン、ノーゲイン』に」，**自由民主月刊**，2001 年 8 月，頁 39～46。

註⑦ 塚崎公義，**圖解よくわかる構造改革**，頁 15。

民營化的規制緩和措施，以逐步除去壟斷性的產業。^⑧

其次在道路公團改革方面，日本道路公團成立於 1956 年，其主要目的是負責日本高速公路及跨海大橋等大型公共建設的興建。由於道路建設涉及日本地方建設規劃及經濟利益分配，因此，道路公團的道路建設往往變成爲自民黨派閥鞏固選票的工具，這讓日本道路公團的債務不斷攀升，例如在 1985 年道路公團的總債務額便高達 22 兆日元，相當於該年營業總額的 7 倍，到了 2002 年更是上升到 40 兆日元。小泉爲了要清償道路公團所負的巨大債務，便於 2001 年 12 月在日本內閣通過「特殊法人組織合理化計畫」，根據這項計畫，日本道路公團將廢除過去 4 個公團的組織，並且重組成爲 5 家公司，將日本高速公路建設管理推向民營化路線。^⑨

由於從過去以來日本道路公團便由派閥議員所把持，小泉的道路公團改革便讓小泉與道路族議員之間產生尖銳的矛盾，爲此小泉首相設計了一個由 7 人組成的道路公團民營化促進委員會，專門負責處理民營化過程中所產生的矛盾和問題。^⑩然而在這 7 人改革小組內部的意見卻不統一，例如委員長今井敬、道路工程學專家中村英夫便反對道路公團民營化，反對停建高速公路，並堅持道路建設仍然必須由國家經營。最後在小泉的堅持下，道路公團改革法案終於在 2005 年 4 月在日本國會當中通過了，同時日本道路公團民營化也正式在 2005 年 10 月 1 日開始執行；日本政府成立了 6 家負責道路建設及管理公司，以及 1 家「道路保有債務償還機構」來負責承接公團的資產和債務。^⑪道路公團民營化之後，一方面雖然有利於提高高速公路的效益，杜絕浮濫投資情況的發生；但是在另一方面，由於道路公團民營化之後只有保留一部分國家的股份，這讓日本道路公團能夠完全擺脫派閥的掌控，而完全保持自主經營權利。^⑫

最後在郵政民營化改革方面，日本郵政體系除了郵務事業之外，還兼具有存放款的銀行功能，因此從明治時期以來，在全國綿密的據點下，郵政體系便成爲日本人民最主要存放款的場所，而郵政體系也成爲全日本最大的銀行。目前日本郵政體系約有 350 兆日圓的存款，全國各地也設有 2 萬 4700 個據點，在過去政府主導經濟時期，日本政府經常透過財政融投制度，將郵政體系的內部存款轉移爲政府公共建設的基金來

註⑧ 齋藤精一郎，「構造改革の本質は『ノーペイン、ノーゲイン』に」，頁 39。

註⑨ 屋山太郎，**道路公團民營化の内幕—なぜ改革は失敗したのか**（東京：PHP 研究所，2004 年），頁 15~18。

註⑩ 日本道路公團民營化促進委員會委員長爲新日本制鐵會長今井敬，成員由武藏工大、中村英夫、石原伸晃、豬瀬直樹、松田昌士等知名教授、專家、作家和政府官員所組成。請參閱田中直毅，**構造改革とは何か**（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1 年），頁 8~10。

註⑪ 這 6 家新公司包括將原來日本道路公團根據地域劃分成立的 3 家公司—東日本高速公司、中日本高速公司和西日本高速公司，以及根據首都高速、阪神高速、本州四國聯絡團等 3 家道路公團成立的首都高速公司、阪神高速公司以及本州四國聯絡公司；這 6 家公司最高負責人全部爲民間人士，同時新成立的「道路保有債務償還機構」將承接 4 個道路公團，總計 4 0 萬億日元的債務，並計畫在 4 5 年之內以道路租賃費等償還道路建設資金，最終實現免費開放高速公路的目標。請參閱屋山太郎，**道路公團民營化の内幕—なぜ改革は失敗したのか**，頁 5~18。

註⑫ 請參閱「道路公團改革と自民黨の造反組」，**讀賣新聞**，2005 年 10 月 1 日，版 1。

源，²³但是這些公共建設卻經常被派閥所把持，形成無效率的公共投資，這也讓政府的財政赤字節節升高；因此從過去以來，日本郵政體系不但是派閥背後最主要經濟來源，也是派閥在地方主要的政治和組織基礎。²⁴

小泉上任之後，積極想以推動郵政民營化來降低政府的財政赤字，但是卻也受到自民黨內派閥的強力反對。自民黨內大老綿貫民輔便擔任反對郵政民營化的「郵政事業座談會」會長，他聯合民主黨的小澤一郎在國會當中以立法手段，共同反對小泉的郵政事業民營化政策，並且也箝制自民黨內支持民營化的力量。因此，小泉的郵政民營化政策不但受到黨內派閥的抵制，同時也遭到許多在野黨及郵政公社的強烈反對；另外郵政系統的 28 萬多名員工也不歡迎民營化改革，因為郵政系統的員工屬於國家公務員，民營化改革之後他們就成為民營企業員工，工作權和收入的穩定性就會受到相當大的挑戰。在眾多的壓力下，小泉的郵政民營化一直無法在國會當中通過。²⁵

舉例來說，在去（2005）年 8 月 5 日，在自民黨與公明黨執政聯盟掌握國會優勢的情況下，日本眾議院雖然以 233 票對 228 票通過了郵政民營化法案，但是到了參議院，由於自民黨內派閥議員倒戈，卻反而是以 108 票對 125 票，以 17 票之差被否決了。郵政民營化法案被參議院否決之後，小泉便決意解散國會重新進行改選，將郵政民營化法案直接訴諸民意；在另一方面，自民黨內反對郵政改革法案的議員也於 17 日宣布脫離自民黨成立「國民新黨」，並投入 9 月 11 日舉行的眾議院改選。最後選舉結果揭曉、小泉獲得國會選舉大勝之後，日本國會才在 10 月 14 日以 338 票贊成、138 票反對，正式通過了郵政民營化相關法案（請參見表一）。²⁶

表一 小泉改革的政治經濟效應

	官僚主導	派閥主導	市場主導
主要銀行體系	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	政府主導模式的轉變 →	
擴大公共建設			
縮減財政赤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²³ Thomas F. Cargill, *Postal Savings and Fiscal Investment in Japan: the PSS and the FIL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6~50.

註²⁴ 高島博，*郵政事業的政治經濟學*（東京：晃洋書房，2005年），頁15~20。

註²⁵ 「道路公團改革と自民黨の造反組」，*讀賣新聞*，2005年10月1日，版1。

註²⁶ 「郵政民營化壓勝の重み」，*讀賣新聞*，2005年10月15日，版1。

當郵政民營化法案通過之後，小泉從 2001 年 4 月上任以來所主張構造改革、日本道路公團改革以及郵政民營化法案，至此才全部付諸實現。下一節則是要分析這次國會改選對日本政經體制會產生何種轉變，也就是郵政民營化的經濟效應及新保守勢力興起的政治效應。

肆、郵政民營化的經濟效應：縮減財政赤字

二次大戰之後，由於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政府巨型公共建設開發，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一方面發行國債來籌措資金，一方面則利用財政融投（Fiscal Investment loan planning, FILP）的方式將郵政體系鉅額的資金移為建設基金。在國債方面，日本政府從 1965 年開始發行建設國債，1975 年緊接著發行赤字國債，1990 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後，日本政府財政急速惡化，例如在 1993 年日本整體財政赤字為 GDP 的 63%，但是到了 1997 年，中央及地方債務卻增加為 133 兆日圓，是 GDP 的 120%。^②舉例來說，在 1997 年日本政府國家總支出當中，國債利息的支付便達 16 兆 8023 億日圓，佔全國總支出 77 兆 3900 億日圓比例的 21.7%，遠高於社會福利支出的 18.8%，及教科文支出的 8.2%。^③

在財政融投方面，日本政府一向善於利用財政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也就是利用政府擴大公共工程支出來提昇國內經濟景氣，而推動建設主要的資金來源便是來自於政府所屬的郵政體系。日本政府利用財政融投的制度將郵政體系內部龐大的資金轉用來進行公共建設，^④在自民黨內派閥的主導下，這些公共建設大量出現農村地區，形成都市與農村公共建設的差距，例如從 1994 年至 1998 年期間，平均每人所能分配到建設經費最高的縣份都是在靠日本海的島根縣，在 1998 年每人平均為 81 萬 1257 日圓，同時島根縣也是自民黨竹下派掌門人竹下登的故鄉；而每人平均分配到經費最少的縣份則都是集中東京都周圍的千葉縣、神奈川縣及埼玉縣，其每人平均只有 23 萬日圓左右，為島根縣的四分之一。^⑤

接下來我們進一步將日本財政赤字與先進工業國家作比較，日本財政赤字從 1993 年之後急遽增加，從原本只佔 GDP 比例的 60%（1993 年）增加至 110%（1999 年），相對於 1999 年美國、英國及德國其財政赤字分別只佔其 GDP 的 55%、54% 及 60%（請參見圖二）。^⑥另外根據川崎一泰的分析，目前日本財政赤字膨脹如此快速，最主要的原因有兩點：首先是 1992 年以降，日本政府為了拯救景氣低迷，而投入大量資金的景氣對策；在 1990 年代總共 8 次的刺激景氣對策，日本政府總共投下 82 兆 5000 億日圓，超過日本政府一年的政府總預算，但是所得到的成果卻是相當有

註② 眞淵勝，「財政政策の成功と金融政策の失敗」，頁 103~105。

註③ 藤岡明房，「橋本の六大改革」，財政，2002 年 1 月，頁 67。

註④ Thomas F. Cargill, *Postal Savings and Fiscal Investment in Japan: the PSS and the FILP*, pp.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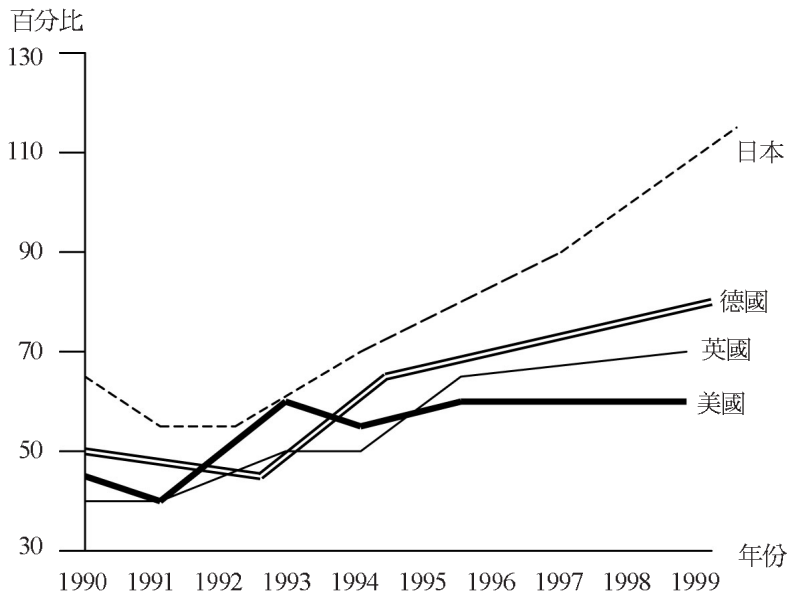
註⑤ 作者根據日本行政投資實績（東京：自治省出版，1996 年至 2000 年）加以整理。

註⑥ *OECD Economic Review*, Dec., 1998, pp. 5~6。



限的。另外一點原因便是日本政府過去以發行國債來進行公共建設的投資，而這些公共投資卻都不是必要的建設，而是成為自民黨議員為了鞏固地方票源所進行的建設；這些無效率的建設，讓日本政府每年必須在總支出中 20 % 來支付國債的利息。^②

圖二 日本財政赤字與各先進工業國政府債務的比較



資料來源：OECD Economic Review, Dec., 2000, pp. 5~6.

財政赤字的持續惡化讓原本衰退的日本經濟更是雪上加霜，因此，日本政府在 1996 年 7 月成立財政制度審議會，並在當年 12 月提出「財政赤字審議會最終報告書」。在這項報告中當中，總共指出日本財政赤字的出現，有絕大部分是出現在不必要的公共建設投資浪費，其有四項重點：首先公共建設通常依附在長期建設的考量下，這些通常忽略現實的需求；第二、公共事業預算的分配集中在高規格幹道及港灣空港等大型建設，而忽略地方建設的配套措施；第三、道路特定財源的制度過分依賴國債的發行，而沒有自我籌措資金的能力；最後則是公共建設必須要逐年縮減，而公共投資的縮減最大障礙，是來自於政、官、財三種勢力的結合，政治人物將公共建設當作是給大企業及地方企業的好處，而這些企業再給予政治人物政治獻金的回饋。^③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在過去日本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日本政府主要是以擴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來刺激經濟的成長，而政府公共支出的最主要來源便是透過財政融投的方式將郵政儲金移轉到公共建設基金；而在郵政體系龐大利益之下，自民黨派閥便

註② 川崎一泰，「財政再建と構造改革」，改革者，2001年3月，頁50~51。

註③ 垣內亮，「國家的リストラねなう財政再建構想」，前衛，1998年8月，頁69~70。

利用國會的郵政族來掌控郵政體系，其目的方面是要以公共建設來穩固地方選票，另一方面則是利用郵政綿密的據點來進行佈椿。因此在派閥的掌控之下，日本大量出現沒有效率的公共建設，這讓日本政府累積鉅額的不良債權，同時在鄉間的郵局也開始出現世襲制的局長，成為派閥在選舉期間於農村地區的最重要樁腳。^④

那麼在去年小泉郵政民營化實施之後對日本政經體制產生何種效應呢？首先在組織方面，根據小泉的「郵政民營化改革相關法案」內容，現有日本的郵政公社將在2007年4月之前完全解散，並將原有的公社業務切割成窗口公司、郵政事業公司、郵政存款銀行和郵政保險公司等四個事業體業務，並進而在2017年3月之前全面民營化；同時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屆時在日本全國擁有有2萬5,000個分支機構、資產高達3兆美金資產、26萬員工資產的日本郵政體系將成為全世界擁有最龐大資產的銀行。^⑤而現在日本各地郵政支局多半由自民黨議員經營，日本郵政改民營等於切斷了自民黨議員的銀根和勢力，這也是此次表決與小泉同屬自民黨的議員有30位議員跑票的最主要原因。^⑥

其次在財政融投方面，根據小泉的「郵政民營化改革相關法案」內容，在2017年3月前將全面廢除政府對存款和保險事業的介入；同時為了降低國內反對聲浪，小泉成立一筆1兆日圓的基金，以保障日本偏遠地區仍可享受到價格低廉的民營郵政服務，並規定控股公司在完全處分存款公司和保險公司的股份後，可買回股份和連續行使議決權，窗口公司的業務範圍也將擴大至銀行業和人壽保險業；同時目前日本郵政當局兼司存款和保險業務，所收的款項會用來購買政府債券。小泉希望通過郵政民營化，將這些巨額存款轉成股票出售，能藉此刺激民間經濟成長；而透過郵政民營化，將售出政府全部郵政公社的股份之後，有助於緩解目前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⑦在瞭解郵政民營化的經濟效應之後，接下來將要探討日本新保守勢力興起的政治效應。

伍、新保守勢力興起的政治效應： 派閥勢力的瓦解

在1945至1952年美軍佔領日本期間，美國為了讓日本徹底改變過去的軍國主義體制，而在日本頒佈了一部非戰憲法，讓日本實施民主體制的內閣制度。但是在日本內閣制運作之下，卻形成自民黨的長期一黨執政，而造成自民黨長期一黨執政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派閥主導，由派閥主導體制運作下形成政界、官界與財界的鐵三角制度。

註④ 高島博，日本型福祉社會と地域社會貢獻の郵政事業（東京：近畿郵政局，1994年），頁40～42。

註⑤ 請參閱「小泉的郵政民營化改革分析」，<http://www.epochtimes.com.tw/bt/5/8/9/n1012554.htm>（2005年12月1日進入）。

註⑥ 「14府縣連，造反22人支援」，讀賣新聞，2005年8月14日，版1。

註⑦ 請參閱「郵政民營化與日本經濟」，<http://www.epochtimes.com.tw/bt/5/7/6/n976377.htm>（2005年12月1日進入）。

在另一方面，日本派閥體制也利用日本年功序列、非正式制度及強大的後援會不斷地擴大勢力，例如在自民黨內是相當強調資深制與倫理輩分的，這不論是在派閥體系內或是黨內組織政治職位的傳承都是一項重要的考量；其次在自民黨的組織架構當中，我們發現非正式組織當中派閥及族議員是實際操縱日本政治的運作；最後在自民黨的外圍組織當中，依據各族議員的議題劃分出現許多不同的後援會，這些後援會成爲族議員在國會中與官僚協商最有利的後盾。^③

其次自民黨派閥也具有相當的政治與經濟基礎。在政治基礎方面，首先族議員與保守官僚體系的結合，族議員與官僚體系的密切配合在過去創造日本高度經濟成長的奇蹟，但在自民黨再執政之後，族議員與保守官僚的結合卻成爲改革的主要阻力；^④其次是政治二世的傳承，在自民黨有計劃栽培政治二世的政策下，許多派閥領導人的子女皆繼承其政治職位，成爲小泉推動經濟改革及新保守主義的要角，例如前首相福田赳夫的兒子福田康夫目前爲內閣官房長官，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兒子石原伸晃目前爲自民黨民營化推進改革本部長。^⑤

在經濟基礎方面，首先是鉅額的地方公共工程補助款，在自民黨各主要派閥領袖的背後皆有所屬的後援團體，例如田中角榮的越山會及加藤紘一的宏池會。這些後援會有兩項目的，第一是可以透過這些後援會來募集政治資金，第二是也可以將補助款透過這些後援會撥給選區來鞏固選票；^⑥其次是日本經濟四團體爲後盾，經濟四團體是與自民黨最密切的經濟團體，其主要有經濟團體連合會（經團連）、日本經營者團體連盟（日經連）、經濟同友會（同友會）以及日本商工會議所（日商），其中經團連是日本業界的大本營，所有參與者幾乎是日本大企業，目前也約有 1000 個企業團體加盟，是日本政府與業界最主要的溝通管道。^⑦

自民黨派閥的壟斷日本政經體制，在 1990 年泡沫經濟破滅後，卻爆發了一連串的金權醜聞，這些弊案導致 1993 年自民黨下台。自民黨下台後由八個政黨組成聯合執政，此時在野黨也進行一連串的世代交替，但是這一股世代交替並沒有影響到自民黨，一直到 2001 年 4 月小泉上台之後情況才有改變。由於小泉的構造改革受到黨內派閥的抵制，讓小泉不斷的拔擢新人擔任黨內要職，例如連任五次的安倍晉三擔任官房長官，同時小泉也積極逼退黨內派閥大老，例如在 2002 年衆議院選舉時，小泉便刻意不提名宮澤派掌門人及前首相宮澤喜一，讓他知難而退出政壇。日本政壇的這股世代交替不但導致日本新保守勢力的興起，同時也導致自民黨派閥勢力的瓦解。

那麼何謂日本新保守勢力呢？而新保守主義議員對日本會產生何種政治效應呢？

註③ 橋本五郎、飯田政之、加藤秀治郎，*日本政治の小百科*，頁 129。

註④ 舩添要一，*政治ニュースがわかる本*（東京：池田書店，2001 年），頁 119。

註⑤ 官界，*官廳人事録：2001 年以降省廳新体制*（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1 年），頁 38～40、126～285。

註⑥ 橋本五郎、飯田政之、加藤秀治郎，*日本政治の小百科*（東京：一藝社，2002 年），頁 113。

註⑦ Bradley M. Richardson, *Japanese Democracy: Power, Coordination and Perform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47～148.

所謂日本新保守勢力是指在 1990 年代積極鼓吹新保守主義思維，由日本松下集團創辦人松下幸之助所成立專門訓練政治家的松下政經塾；在當時許多學有專精同時有志進入政界的日本年輕人都會到松下政經塾上課，以為將來的競選及從政做準備，而 1990 年之後日本國內政局的轉變正好給予這些年輕的新保守勢力蔓延的溫床。^④ 1990 年初期，小澤一郎率領大批議員出走另組新黨，形成日本政黨的戰國時代，這不但造成自民黨的垮台，同時也給予新保守主義發揚的空間，當時日本新興政黨紛紛成立，許多無從政經驗的新人也在這個時候進入政壇。這些二次戰後出身的年輕人，既沒有日本極右派的軍國主義色彩，也沒有自民黨保守的親美思想，也沒有社會黨左派的反戰思想，他們一切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導向，以務實的作風來處理日本的外交政策。這種新保守主義投射在經濟政策上便是喊出日本應該要改變 1955 年體制，終結派閥主導及振興日本經濟。^④

因此，有人稱日本在 1990 年代的轉變為日本政壇的第一次世代交替，但是在去年 9 月 11 日日本舉行眾議院選舉，在這場選舉過程當中，小泉趁著郵政民營化的機會一一消滅黨內的派閥；同時注入高知名度、具有公眾形象，而有別於過去政治二世及官僚體系的候選人，成功地讓 83 名新議員進入國會，形成日本戰後第二次的世代交替。這次的世代交替徹底改變了自民黨，同時也讓日本新保守勢力合流在一起。^⑤

接下來則是要分析新保守主義的興起對日本所產生的政治效應。首先是自民黨派閥勢力的崩解。自民黨歷經去年的國會改選，雖然只有少數派閥議員追隨綿貫民輔成立國民新黨，但是包括前自民黨總務會長及堀內派掌門人堀內光雄、前經濟產業大臣平沼赳夫以及前郵政大臣野田聖子等派閥大老，卻都宣布以無黨籍身份投入這次國會改選；同時自民黨內最大派閥橋本派掌門人橋本龍太郎也宣布引退的效應，再加上小泉在這些反對他的派閥大老選區當中推出形象清新候選人來卡位。因此，歷經這次的脫黨風波及即將來到的國會選舉之後，自民黨內派閥無論在人數及勢力都將大不如前。

註④ 日本自從 1955 年體制以來，國內政壇存在著三種政治勢力，第一種是以自民黨為主體的親美右派保守勢力，他們鼓吹參與美日安保條約，並追隨美國的東亞政策，同時採取美國與亞洲國家並重的外交政策；第二種是以社會黨為主體的反戰左派勢力，他們反對與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同時也不贊成日本進行再武裝，日本應該採取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第三種是寄居自民黨及無黨籍的極右派軍國主義，他們仍然維持過去的皇權思想，鼓吹日本皇國史觀以及強調日本種族的優越性。但是冷戰結束之後，在國際環境的轉變下，日本國內開始出現另外一種聲音，他們認為日本地處在東亞地區，應該要積極參與亞洲事務，同時終戰已經五十週年了，日本也要跳脫過去歷史的包袱，讓日本成爲一個正常國家，同時也要積極維護日本的民族利益及實現日本國家戰略；因此，參拜靖國神社及善用朝鮮半島危機來改變日本的防衛政策，則變成呼應新保守勢力主張的主要利器，這便是日本的新保守主義。出井康博，*松下政經塾とは何か*（東京：新潮新書，2004 年），頁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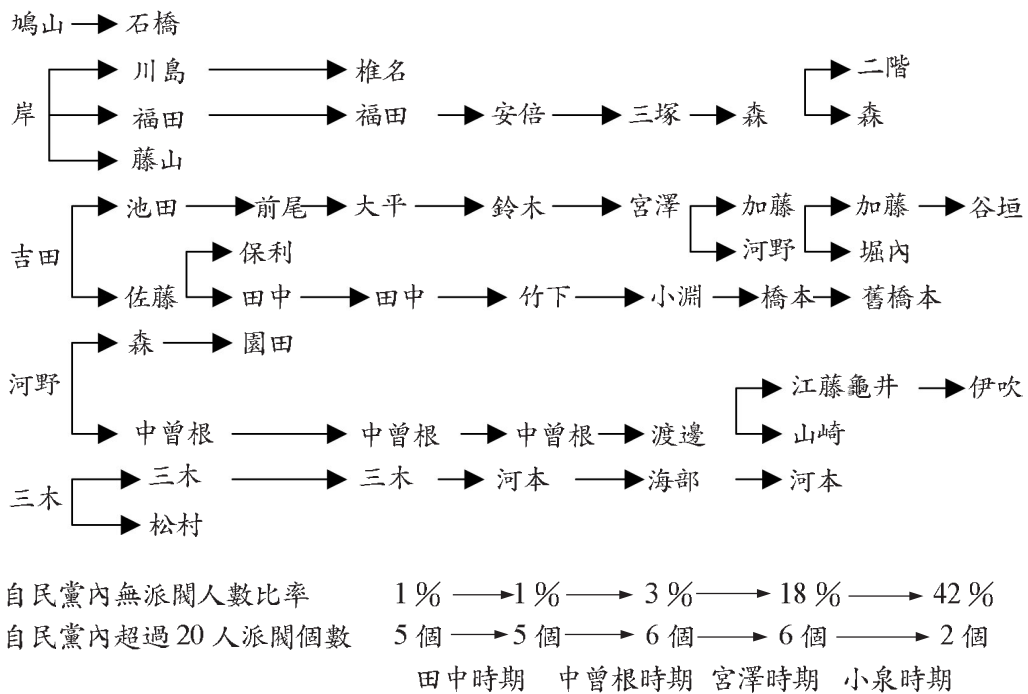
註④ 有關日本右派保守勢力文獻，請參閱猪野健治，*日本の右翼*（東京：筑摩書房，2005 年）；鈴木邦男，*新右翼—民族派の歴史と現在*（東京：彩流社，2005 年）；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東京：勁草書房，1993 年）；天道是，*右翼運動 100 年の軌跡—その抬頭・挫折・混迷*（東京：立花書房，1992 年）；政治經濟學研究會，「*神國日本*」大綱：憂國・愛國・救國真正右翼民族主義で國辱の經濟破綻か（東京：政治經濟學研究會，2002 年）。

註④ 藤原敏隆，*保守王國の崩壊：平成十年政變の"眞實"*（東京：創風社，1999 年），頁 22~28。

④

其次是日本官界、政界及財界鐵三角制度的瓦解。日本政壇雖然在 1990 年代出現第一次的世代交替，但是該次世代交替卻只限於在野政黨，自民黨內仍然充斥政治二世與官僚出身的政治人物。這次小泉在許多選區推出高知名度、公眾人物及沒有從政經驗的候選人，顛覆過去自民黨總是推出政治二世及地方議員出身候選人的傳統，這讓自民黨內真的進行大換血，同時也徹底瓦解過去官界、政界及財界鐵三角制度依賴政治二世的傳承及官僚體系空降的傳統（請參閱圖三）。④在瞭解日本新保守勢力興起的政治效應之後，接下來將要探討全球化對日本政經體制轉變的影響。

圖三 戰後日本自民黨派閥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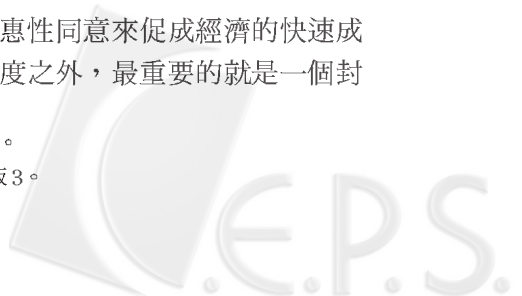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以下兩本書整理而成，福岡正行，現代日本の政黨政治（東洋經濟新報社，1986年）；政界、官庁人事錄：2005年以降の省廳新體制（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5年）。

陸、全球化與日本政經體制的轉變： 以日本道路公團改革為例

從二次大戰之後，日本以政府主導及企業配合的互惠性同意來促成經濟的快速成長。政府主導經濟發展除了日本政府所建構的非正式制度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封

註④ 「國民新黨，5人結成」，讀賣新聞，2005年8月18日，版3。

註⑤ 「基礎がわかる，衆院選」，讀賣新聞，2005年8月23日，版3。



閉式的經濟體，企業配合政府的政策除了日本政府的偏好性貸款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企業對經濟成長的期待。日本政府所營造的封閉式經濟體在 1970 年代讓日本的財政政策無往不利，並且安然渡過 1970 年中期的石油危機。自此日本持續的經濟成長，讓日本企業從來不知何謂經濟衰退，並以源源不絕的政治獻金來堅定其對自民黨政權的支持。^④

但是 1985 年之後整個情況卻完全改觀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紐約廣場協議之後，外來資本逐漸打破日本經濟的藩籬，這雖然讓日本企業多了一項籌措資金的管道，但同時卻也逐步弱化了日本政府的管制角色；但是日本卻依然不斷地以政府主導的擴大公共支出的方式來推行經濟政策，逆勢而為的結果便是讓政府的主導權從過去的官僚體系轉移到政治派閥的手中。^⑤政治派閥在掌控政治權力之後，利用了過去經濟成長的利器—日本郵政體系及日本道路公團來壯大自己政治實力，同時也擴大了本身的經濟基礎。這不但讓日本爆發一連串的金權弊案，同時也在雙赤字下（政府財政赤字及銀行不良債權）造成日本長達十五年的平成不況，因為由派閥所主導的無效率的財政政策，讓日本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斷高築，同時泡沫經濟破滅後企業的接連倒閉，也讓日本銀行的不良債權節節升高。^⑥

從 1990 年以來日本的經濟衰退，日本政府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找出病灶，因為由派閥所推舉出身的日本首相只能在正式制度上做片面的改革，例如選舉制度改革、財政改革、金融改革及行政官廳的改革，而無力在政界、官界及財界的鐵三角機制運作做根本的解決。因此當 2001 年沒有派閥包袱的小泉純一郎上台之後，便積極要改變日本的政治經濟體制，讓日本能夠逐漸適應全球化之後的國際環境，因此小泉他一方面大量引進新人來稀釋派閥在自民黨中的政治影響力，以改變過去派閥、官僚及企業的鐵三角機制運作；^⑦另一方面，他也進行非正式制度的改革（郵政民營化及道路公團改革）來剷除派閥的經濟基礎，以改變地方派閥、地方樁腳及地方企業的利益共同體關係。但是小泉的改革卻遭到自民黨內派閥及保守官僚的反撲，一直到去年 9 月 11 日國會改選之後，小泉的構造改革才算完成，這讓日本經濟從 2003 年以來開始成長，逐漸走出衰退的陰霾。由此可見，日本這波的政經改革完全是肇因於全球化，也就是全球化改變日本的政經體制。^⑧以下將以日本道路公團改革來解釋全球化對日本政經體制的影響。

在二次大戰後，日本從 1955 年體制權力之後便開始全力發展經濟，而道路建設便是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一環，於是日本政府在 1956 年成立了日本道路公團，這是一個由政府出資，建設省監督管理，同時由建設大臣任命總裁的特殊法人。所謂「公

註④ 富森馭兒，*日本型民主主義の構圖*（東京：朝日新聞社，1993 年），頁 44～46。

註⑤ 佐和隆光，*平成不況の政治經濟學*（東京：中公新書，1994 年），頁 7～15。

註⑥ 村松岐夫，奧野正寬編，*平成バブルの研究：崩壊後の不況と不良債權處理*，頁 164～165。

註⑦ 塚崎公義，*よくわかる構造改革*，頁 15～19。

註⑧ T. J. Pempel, *Regime Shift: Comparative Dynamics of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

團」是指由政府經營的特殊公用事業組織。之後隨著經濟的發展，日本政府又成立了首都高速公路公團、阪神高速公路公團和本州四國公路橋公團，成為四大道路公團鼎立的局面。^{⑤③}

接下來日本政府道路建設的資金來源主要有三種：一、國庫支出，主要來自於汽油稅、石油煤氣稅和一般財源；二、地方經費，主要來自於地方道路稅、石油煤氣稅、輕油交易稅、汽車所得稅及一般財政支出；三、財政融投，主要來自於郵政體系的龐大儲金。而道路公團身為一個特殊法人組織，其主要建設經費來源除了過路費用的營收之外，一旦過路費用不敷運用，另一項重要的經費來源便是來自於財政融投，也就是郵政體系的龐大儲金。^{⑤④}

從過去以來，日本的高速公路建設一直具有明顯政治意涵，因為日本的政治家大多是由故鄉的選民所選舉的，議員們為故鄉爭取到重大建設專案，意味著為故鄉爭取到金錢流入和就業機會，同時也意味著選票增加，而道路及橋樑就與為此作出貢獻的議員的名字連在了一起。^{⑤⑤}另一方面，日本道路建設也是政治資金來源，但是日本議員並不直接從道路工程中拿錢，而是在建設道路的名義下為自己張羅資金；也就是當道路計畫頒佈後，國會議員要求工程公司讓自己的後援會所屬的建設公司投標，得標後建設公司將承包金額的3%作為政治獻金予以回報。^{⑤⑥}

因此，日本派閥議員、官僚及地方企業逐漸壟斷了整個高速公路的建設和管理市場；同時，高速公路的建設大軍（其不僅包括大量勞動者，還包括大量從建設省退下來的幹部）便成為鐵三角背後的有力支柱。這股勢力在日本被稱之為「道路族」，著名日本政治家田中角榮、金丸信、竹下登及古賀誠等都是「道路族議員」，同時自民黨為了要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長期以來都非常重視這一勢力；而「道路族」出於自己的利益考慮，也長期依附在執政的自民黨當中。^{⑤⑦}在派閥的把持下，日本道路建設不是基於經濟需求及經濟效率的考量，而是基於派閥本身政治利益的考量，這讓日本道路公團累積鉅額的債務，而瀕臨倒閉的邊緣。

但是小泉在去年9月獲得國會選舉大勝之後，道路公團改革已經於2005年10月1日正式啟動了，成立了6家負責道路建設和管理公司以及1家「道路保有及債務償還機構」來負責承接公團的資產和債務。6家新公司包括將原日本道路公團根據地域

註⑤③ 清水草一，この高速はいらない：高速道路構造改革私案（東京：三推社，2002年），頁2~3。

註⑤④ 五十嵐敬喜、小川明雄，公共事業をどうするか（東京：岩波新書，1999年），頁1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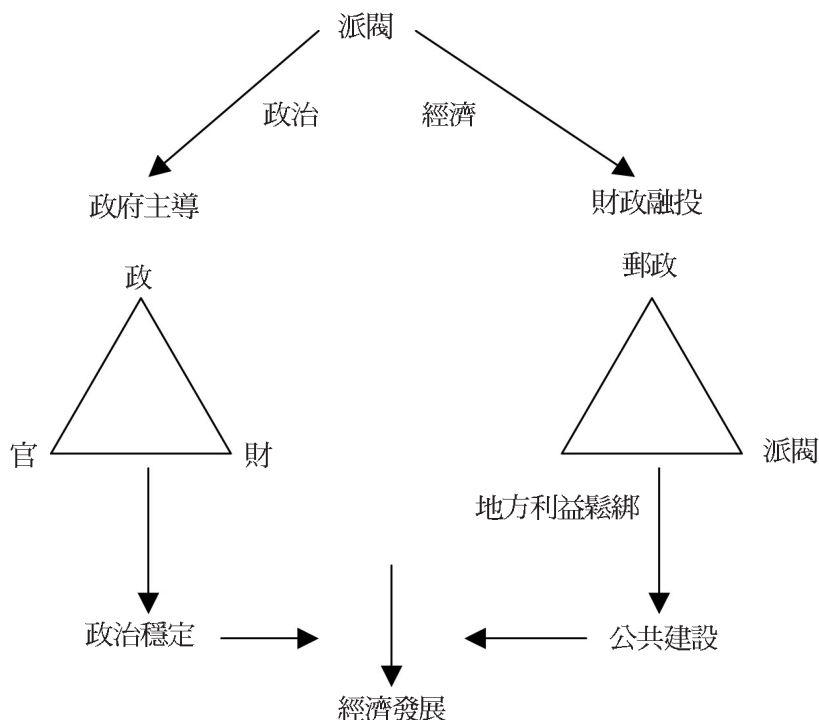
註⑤⑤ 因此民主黨議員高山智司說：道路是瀝青的活廣告；另一位熟悉地方行政事務的記者四方洋說：道路族之所以要將高速公路拉到自己的故鄉去，是因為還可以高速公路為起點，使國道、市村鎮道路的修建成為可能，這樣高速公路的枝葉部分也就能掙到錢了。請參閱屋山太郎，道路公團民營化の内幕—なぜ改革は失敗したのか，頁6~12。

註⑤⑥ 日本政治評論家屋山太郎指出：道路對於政治家來說是確確實實的一項資金來源，而且只有執政黨才能擁有它，這與意識形態與政治理念是絲毫沒有關係的，這是一個只有金錢的世界，而一旦道路建設減少，將直接影響到政治資金來源。請參閱屋山太郎，道路公團民營化の内幕—なぜ改革は失敗したのか，頁60~62。

註⑤⑦ 屋山太郎，道路公團民營化の内幕—なぜ改革は失敗したのか，頁44~45。

劃分成立的 3 家公司——東日本高速公司、中日本高速公司和西日本高速公司；以及根據首都高速、阪神高速、本州四國聯絡團等 3 家道路公團成立的首都高速公司、阪神高速公司以及本州四國聯絡公司。上述 6 家公司最高負責人全部為民間人士，新成立的「道路保有及債務償還機構」將承接 4 個道路公團總計 40 萬億日圓的債務，並計劃在 45 年內以道路租賃費等償還道路建設資金，最終實現免費開放高速公路的目標。^⑤

圖四 全球化與日本政經體制轉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再來看小泉改革的政治經濟效應。我們可以將日本的政治經濟體制轉變過程劃分為政府主導模式的轉變及經濟投資模式的轉變。在政府主導模式的轉變方面，又可以區分成官僚主導、派閥主導及市場主導三個時期；經濟投資模式的轉變方面，也可以區分成主要銀行體系、擴大公共建設及縮減財政赤字三個時期。以日本的政治發展過程為例，官僚主導模式便是在 1955~1985 年的五五體制時期，派閥主導模式是在 1986~1990 年的泡沫經濟時期，市場主導時期則是在 2000 年至今的政治改革時期；另外以日本經濟發展過程為例，主要銀行體系是在 1955~1985 年的五五體制時期，擴大公共建設是在 1990~2000 年的經濟衰退期，縮減財政赤字則是在 2000 年至今的小泉時期。

註⑤ 清水草一，この高速はいらない：高速道路構造改革私案，頁 223~231。

接下來我們發現小泉的道路公團改革及新保守勢力的興起，將日本從派閥主導模式轉變為市場主導模式；小泉的構造改革則是將日本擴大公共建設的模式轉變為縮減財政赤字的模式；最後郵政民營化的改革不但改變日本的政府主導的模式（派閥主導轉變為市場主導），也改變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擴大公共工程轉變為縮減財政赤字）（請參見表二）。

表二 小泉改革的政治經濟效應

政府主導模式的轉變 →

	官僚主導	派閥主導	市場主導
主要銀行體系	五五體制時期 (1955-1985年)	泡沫經濟時期 (1986-1990年)	政治改革時期 (2000至今)
擴大公共建設	經濟衰退時期 (1990-2000年)	郵政民營化 (2005年)	構造改革 (2001年至今)
縮減財政赤字	構造改革時期 (2000年至今)	道路公團改革 新保守勢力興起 (2005年)	小泉改革 (2005年11月)

經濟投資模式的轉變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柒、結 論

從 1990 年以來針對日本經濟的長期衰退，各家出現許多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是財政政策的失調、有人認為是不良債權的高築，也有人認為是金融政策的失敗；^⑨但是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因素，90 年代日本經濟衰退的最重要因素是來自於全球化的效應。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企業獲得多重資金的管道，政府多重管制逐漸鬆綁，這讓過去日本政府主導模式逐漸失靈，在政策失靈的情況下，派閥逐漸掌握政策的主導權，在派閥講究地方利益及權力穩固的基礎下，形成財政赤字的擴大及不良債權的高築。因此日本政府若要進行改革，應該要從整頓自民黨派閥體制做起。從 1990 年以來日本歷任首相都是派閥推舉出身，而無法大刀闊斧進行改革；2001 年沒有派閥包袱的小泉上任之後，才有能力對政經體制進行全面性改革。小泉的改革遭遇到派閥強力的抵制，可是日本經濟的持續衰退卻營造小泉改革的力量與環境，讓小泉得以放手對派閥進行改革。

註⑨ 浜田宏一、堀內昭義，日本經濟的危機論爭：長期停滯的真因を解明する（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4 年）。

根據今年最新的經濟統計數字，日本經濟已經連續六季出現成長，這是從 1992 年以來從沒有的現象，由此可見在小泉的政經改革政策下，日本不但拋棄過去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同時也將逐漸從過去的經濟衰退泥沼當中走出，^⑩從本文各節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四點結論：

首先，日本從 1990 年以來正式制度的轉變主要是因為全球化的影響。全球化不但讓日本企業獲得資金的管道多元化，同時也讓日本政府的控制能力逐漸衰弱；但是日本政府仍然堅持使用政府主導的政策模式，結果使得日本陷入長期經濟衰退的泥沼當中。其次，從 2000 年以來，日本非正式制度的轉變主要是因為國內經濟的持續衰退，國內經濟的衰退營造小泉改革的力量與環境，讓小泉能夠進行構造改革、道路公團改革及郵政民營化改革，這些改革徹底改變過去日本政府主導的政界、官界及財界的鐵三角體制，同時也讓日本的經濟逐步復甦。

第三，小泉所實施的郵政民營化政策，不但切斷了自民黨議員的銀根和勢力，同時也全面廢除政府對存款和保險事業的介入。小泉希望通過郵政民營化，將這些鉅額存款轉成股票出售，能藉此刺激民間經濟成長，同時也透過郵政民營化，將售出全部郵政公社的股份之後，有助於緩解目前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最後，去年選後日本新保守主義的興起，不但造成自民黨派閥勢力的崩解，同時也造成日本官界、政界及財界鐵三角制度的瓦解，例如小泉大量提名新人同時讓 83 位新議員進入國會，及派閥大老的脫黨參選等因素。因此歷經這次的脫黨風波及國會選舉之後，自民黨內派閥無論在人數及勢力都將大不如前。

因此，去年國會改選是日本戰後 1955 年體制以來最重要的一次選舉，因為它不但打破日本五五體制的政府主導模式，同時徹底瓦解派閥主導經濟政策的方式。在歷經十五年的摸索，日本已經逐漸找到如何調適全球化浪潮，來建立適合自由化之後日本的最佳體制。

* * *

（收件：94 年 12 月 8 日，接受：95 年 1 月 11 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⑩ 有關日本經濟復甦的新聞，請參閱「日本經濟已連續四季成長復甦力道強勁」，<http://news.yam.com/afp/fn/200508/20050811831653.html>（2005 年 12 月 1 日進入）。



The Implication of Japanese Diet Election in 2005

Zheng-jia Tsa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Second Divis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Due to globalization trends of the 1990s, East Asian states have carried out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market liberalization. But Japan is one of the states has been most limited. When the Japanese premier, Junichiro Koizumi, lead the Liberal Democracy Party to overwhelming success on September 11, 2005, an overall change has begun in Japanese politics. After the election, Highway Union reformation and Post privatization result i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lans within the LDP. On the other hand, the entrance of a large number fresh congressman into the Diet will facilitate the convergence of neo-conservation. The prime argume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Japanese economic recession from the 1990 is the main impetus for the tremendous change. The long-term recession in Japan is also closely linked to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globalization dimension the implication of the Japanese diet election in 2005.

Keywords: neo-conservation; Post privatization; highway union reformation; clans politics; Liberal Democracy Party; Japan



參考文獻

- 「14 府縣連，造反 22 人支援」，**讀賣新聞**，2005 年 8 月 14 日，版 1。
- 「自民黨壓勝 296 議席」，**讀賣新聞**，2005 年 9 月 12 日，版 1。
- 「國民新黨，5 人結成」，**讀賣新聞**，2005 年 8 月 18 日，版 3。
- 「基礎がわかる，衆院選」，**讀賣新聞**，2005 年 8 月 23 日，版 3。
- 川崎一泰（2001），「財政再建と構造改革」，**改革者**，3 月，50-51。
- 丹羽春喜（2001），「小泉構造改革で日本は破局を迎える」，**正論**，9 月，149-151。
- 五十嵐敬喜、小川明雄（1999），**公共事業をとうするか**，東京：岩波新書。
- 天道是（1992），**右翼運動 100 年の軌跡——その抬頭・挫折・混迷**，東京：立花書房。
- 出井康博（2004），**松下政經塾とは何か**，東京：新潮新書。
- 田中直毅（2001），**構造改革とは何か**，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舛添要一（2001），**政治ニュースがわかる本**，東京：池田書店。
- 行政投資実績**，東京：自治省出版，1996 年至 2000 年。
- 佐和隆光（1994），**平成不況の政治經濟學**，東京：中公新書。
- 村松歧夫（2002），**奥野正寬編，平成バブルの研究：崩壊後の不況と不良債權處理**，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官界、官廳人事錄：2001 年以降省廳新体制**（2001），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青木昌彦、奥野正寬及岡崎哲二編著（2000），**市場の役割、國家の役割**，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8 月。
- 垣内亮（1998），「國家的リストラねなう財政再建構想」，**前衛**，8 月，69-70。
- 姜英之（2001），**韓國經濟挫折と再挑戰：漢江の奇蹟は二度起こるか**，東京：社會評論社。
- 屋山太郎（2001），「財政構造改革の成否が小泉改革のカギだ」，**世界週報**，6 月 12 日，25-36。
- （2004），**道路公團民營化の内幕——なぜ改革は失敗したのか**，東京：PHP 研究所。
- 政治經濟學研究會（2002），**「神國日本」大綱：憂國・愛國・救國真正右翼民族主義で國辱的經濟破綻か**，東京：政治經濟學研究會。
- 政界、官廳人事錄：2005 年以降の省廳新體制**（2005），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眞淵勝（2002），「財政政策の成功と金融政策の失敗」，**村松歧夫、奥野正寬編，平成バブルの研究：崩壊後の不況と不良債權處理**，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98-99。
- 高島博（1994），**日本型福祉社會と地域社會貢獻の郵政事業**，東京：近畿郵政局。
- （2005），**郵政事業の政治經濟學**，東京：晃洋書房，15-20。
- 清水草一（2002），**この高速はいらない：高速道路構造改革私案**，東京：三推社。

- 「衆院解散，9月11日投票」，*讀賣新聞*，2005年8月9日，版1。
- 堀幸雄（1993），*戦後の右翼勢力*，東京：勁草書房。
- 富森馭兒（1993），*日本型民主主義の構圖*，東京：朝日新聞社。
- 塚崎公義（2001），*圖解よくわかる構造改革*，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2001），*よくわかる構造改革*，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鈴木邦男（2005），*新右翼——民族派の歴史と現在*，東京：彩流社。
- 福岡正行（1986），*現代日本の政黨政治*，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橋本五郎、飯田政之、加藤秀治郎（2002），*日本政治の小百科*，東京：一藝社。
- 藤岡明房（2002），「橋本の六大改革」，*財政*，1月，67。
- 藤原敏隆（1999），*保守王國の崩壊：平成十年政變の"眞實"*，東京：創風社。
- 齋藤精一郎（2001），「構造改革の本質は『ノーペイン、ノーゲイン』に」，*自由民主月刊*，8月，39-46。
- 樋渡展洋（1991），*戦後日本の市場と政治*，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年。
- 浜田宏一、堀内昭義（2004），*日本經濟の危機論争：長期停滯の眞因を解明する*，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
- 猪野健治（2005），*日本の右翼*，東京：筑摩書房。

- Amsden, Alice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oki, Masahiko, and Hugh Patrick (eds.) (1994), *The Japanese Main Bank System: Its Relevance for Developing and Transforming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lder, Kent (1993), *Strategic Capitalism: Private Business and Public Purpose in Japanese Industrial Fina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rgill, Thomas F. (2003), *Postal Savings and Fiscal Investment in Japan: the PSS and the FIL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urtis, Gerald (1999), *The Logic of Japanese Politics: Leaders, Institutions, and the Limits of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ields, Karl (1995), *Enterprise and the State in Korea and Taiw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unabashi, Yoichi (1987), *Managing the Dollar: From the Plaza to the Lound*,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Gao, Bai (2001), *Japan's Economic Dilemm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imes, William (2001), *Unmaking the Japanese Miracle: Macroeconomic Politics*,

- 1985-200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ggard, Stephan (1990),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OECD Economic Review*, Dec., 1998, 5-6.
- Pempel, T. J. (1998), *Regime Shift: Comparative Dynamics of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on, Bradley M. (1997), *Japanese Democracy: Power, Coordination and Perform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oo-Cumings, Meredith (ed.) (1999),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小泉的郵政民營化改革分析」，<http://www.epochtimes.com.tw/bt/5/8/9/n1012554.htm>（2005年12月1日進入）。
- 「郵政民營化與日本經濟」，<http://www.epochtimes.com.tw/bt/5/7/6/n976377.htm>（2005年12月1日進入）。
- 「日本經濟已連續四季成長復甦力道強勁」，<http://news.yam.com/afp/fn/200508/20050811831653.html>（2005年12月1日進入）。